

知识分子只该服膺真理

不久前,知识界出了一件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北京的一位学者吴法天跟一名女记者周燕在微博上约架,后来他们真的约成了,吴法天换了周燕小姐几拳,被护送离场。

最近有很多人说你们知识分子怎么能这样,这是不是有辱斯文?也有人说,我早就想抽这个吴法天了,他太欠抽了,于是就有人讨论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再看过去几年,我们还目睹了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最受关注的当然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到最后,出现了两派,这两派当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过世的、我很敬佩的大哲学家科亨,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哲学家。他在2009年去世时,很多英美主流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学者德沃尔金写的。德沃尔金的很多观点跟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1960年代开始认识,天天做学术辩论,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还曾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他们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A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科亨和德沃尔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派帕菲

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现场的学生大呼过瘾。大家想一想,今天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我讲这些例子想说明什么?我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他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解你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对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

知识分子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立场。知识分子如果说有立场的话,他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这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

(摘自《博客天下》2012年20期 梁文道/文)

回 回 回 回

『好心办坏事』的法律

法律条文固然要求严谨缜密,但如果过于死板和绝对,却同样也会“好心办坏事”,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法律都不鼓励人们加班加点地工作。在瑞典的阿斯托普市,法律则干脆规定,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加班加点地工作。这项规定的初衷本来是要维持同行业从业者之间的竞争公平,但这种过于绝对的做法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例如每到节假日,大大小小的商铺就会门窗紧锁。就是在平时,过了19点就买不到东西,这就害得瑞典人总要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不过麻烦可远不止这些。有一天,阿斯托普市的一名警察发现一个人从一家电器商店偷了东西,于是立即追了上去。眼看着就要追上小偷时,教堂大钟敲响了11下,警察戛然而止。原来他的下班时间到了,再追就违反了法律,即使抓到小偷也不能审判,还会被小偷反告一状,于是这名警察只好“望贼兴叹”。

英国一个叫高维甘比的小城市也有一条独特的规定:新市长上任时要过磅,并向市民公布体重。等到市长离任时,还要再称一下体重,如果体重下降了,即使市长在任期内没有做出多少成绩,也会得到市民的肯定。这条规定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因为该市的居民认为市长是人民的公仆,应当鞠躬尽瘁地为市民服务,而不能养尊处优。但这却苦了历任的市长大人,他们往往被迫在上任前吃补增肥,离任前节食减肥。

在肯尼亚,法律规定自杀是犯罪行为,因此对于自杀不死的人还要判刑。曾有一位地方官员因为迟迟拿不到自己应得的债款而自杀,被人发现后救下。后来,法院竟判了他3年徒刑。对此,他表示强烈不满:“既然不许我死,就应该叫我好好地活着啊!”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旧金山市的一条法规:“禁止在人行道上拍打地毡,除非是在午夜到上午八点之间”。这条法规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地毡上的灰尘弄脏过路的行人,不过这可害苦了当地居民。他们往往会在午夜时分被重击的声音惊醒,因为邻居只能在此时清理地毡。而之所以采用重击拍打的方式,其实同样是因为不想坐牢——旧金山市的另一条法规规定:“午夜至上午8点之间禁止使用吸尘器”。(摘自《探索揭秘》刘勇/文)

一个乘客的车站

在英国苏格兰有个叫布里奇的火车站,它与其他车站不同的是,多年来,在这个车站上下车的乘客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现年64岁的沃诺克。布里奇车站是以沃诺克居住的村名而命名的。2002年,不知苏格兰铁路公司出于什么考虑,在这个近乎荒无人烟的地方修建了车站。不过,对于在爱丁堡有着一个皮货公司的沃诺克来说,无疑是件天大的好事。

自从建起了这个车站后,给沃诺克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他每天早晨会在8点钟不慌不忙地来到车站,然后准时坐上8:02分的火车去公司上班,又在下午5点58分时再从爱丁堡乘车返回。

令沃诺克意想不到的是,刚进入2004年,苏格兰铁路公司突然决定关闭布里奇车站!理由是这个只有一个乘客的小站,铁路部门每年用于维持的费用却高达34000英镑,仅保养费一项每年就要开支9000英镑。

沃诺克立即写信给苏格兰铁路行政部门和铁路公司,详细阐述了布里奇车站不应关闭的理由:“没错,这个车站确实只有我一个乘客,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生命价值,都有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我当然也不例外。鉴于,任何企图关闭布里奇车站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虽然沃诺克言之凿凿,但英格兰铁路公司还是以赔本为由,仍坚持要关闭该车站。这让沃诺克很生气,他坚决不予妥协。在每天坚持写信申诉的同时,还多次去苏格兰铁路行政部门找他们的负责人当面理论。

转眼4年过去了,铁路公司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说服沃诺克的过硬理由,无奈之下,只好交由苏格兰铁路行政部门进行裁决。

苏格兰铁路行政部门最终做出了艰难裁定:布里奇火车站的存在合情合法,准许继续保留,沃诺克最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事后他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胜利,而是关乎到社会对任何一个人生命价值尊重与否的大事,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坚决斗争。我在赢得自我尊严的同时,也为民众维护自身权益树立了榜样,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摘自《现代青年》陈达明/文)

被“过度宠爱”的中国人

中国家长“宠”孩子是全世界有名的。不但上学亲自接送,而且特别碰到重要考试的时候,学校门口通常都会站满等候的家长。在我这个日本人看来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我所在公司的员工,碰到下班时下雨,居然会叫自己父母来送雨伞!

记得我自己的孩子在中国读小学的时候,一年冬天,突然降温,我们父母因为工作忙没顾上他们,没给他们加衣服就让他们去上学。结果学校老师居然打来电话,批评我们家长“太关心孩子”。

爱孩子是中国人的美德,我不反对,但爱到“宠”的地步,在我们外国人看来就有些过分了。比如我坐地铁或公交车时常常发现,年老的家长拿着大包小包地站着,老大不小的孩子却坐在椅子上舒适地玩着手机。

还记得有一次,公司因业务繁忙需要加班到很晚。一位女员工到了晚上10点多居然哭了起来,说要下班,我没有同意。过了半小时,这位女员工的男朋友气势汹汹地冲到公司,拉着女朋友的手说:“我们不干了,回家吧!”并且扬言说要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公司。(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28期 关田刚司/文)

皇帝为何偏爱『二』将

李世民偏爱程咬金,李隆基与杨玉环宠爱安禄山,梁山头领宋江喜欢李逵,岳飞推崇牛皋,李自成纵容刘宗敏……历史上那些被偏爱的将领都具备一个共性:有点儿“二”。

这些有点儿“二”的将领,之所以受到上司的赏识,大概离不开“纯朴”的可爱。所谓“纯朴”,是需要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作保证的。在“纯朴”的前提下,上司不仅偏爱他们,而且还能容忍他们的异见。相对于深刻的异见,上司们更喜欢纯朴的异见。

比如李自成对刘宗敏和李岩的态度就迥然不同。李自成纵容刘宗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刘宗敏强占吴三桂妾陈圆圆,拒不出兵山海关,敢在武英殿军事会议上顶撞李自成,并扬言“大家都是做贼的,凭什么你在北京享受,让我去前线卖命?”如此粗暴的态度,李自成忍下了,但是对温文尔雅的李岩却水火不容。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李岩乃大智,才华在上司李自成之上,而刘宗敏虽然粗暴,却头脑简单,在智力上不是李自成的对手。李岩之所以被李自成弄死,就是因为他表现得不够“二”,他的异见太深刻了,一点也不“纯朴”。自然李自成很介意很不喜欢。

李岩死于不“二”,而安禄山则成于“装二”。众所周知,盛唐终于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主角是胡人安禄山。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期,唐玄宗和杨贵妃对这位胡将是恩宠有加、毫无防范的,并非唐皇眼拙,而是这位安将军太会装傻充愣了。作为一位雄霸东北的军阀,安禄山不可能是省油的灯。但在唐玄宗面前,他不仅大作忠勇状,而且不时冒傻气。

唐玄宗曾开玩笑指着安的肚子说:“这个人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怎么这个大啊?”安禄山答:“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一颗赤心!”唐玄宗叫安禄山拜见太子,安禄山不行礼。左右的人催促他下拜,安禄山站着说:“我是胡人,不知道朝廷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唐玄宗说:“这就是储君,我死后,他代替我领导你们。”安禄山说:“我很愚钝,过去只知道陛下您一个人,不知道还有储君呢。”做出不得已的样子,然后下拜。

安禄山要做杨贵妃的干儿子。唐玄宗与杨贵妃一起坐着,安禄山先拜杨贵妃。玄宗问为什么这样,安禄山回答:“我们胡人就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只认老子不认儿子,尊重老婆甚于自己,这么“二”的封疆大吏,真令皇帝又开心又放心,怎能不喜不自禁?待到此狐变脸时,唐明皇大跌眼镜不敢相信,自己竟被那么冒傻气的家伙忽悠了,原来自始至终都是“伪豪爽”、“伪忠诚”。

“二”者多福,自古以来,也是中国历史中不成文的一项游戏规则。

(摘自《廉政瞭望》2012年8期 程万军/文)

新中国“22大明星”诞生记

6月底,陈强、张瑞芳两位老电影艺术家相继去世,他们都是1962年评出的新中国“22大明星”成员。近日,“22大”中的王晓棠、秦怡、于蓝、庞学勤和谢芳,分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谈及当年的评奖始末。

新侨会议上周恩来的提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新侨饭店召开,也称“新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重提“双百”创作方针。

会议期间,6月22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编导、演员共30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

在谈到明星体制问题时,周恩来认真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

原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发行过一套苏联电影演员的大头照片,辅以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剧照,悬挂在电影院、工人俱乐部里。

周总理叮嘱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把中国自己的明星选出来,挂上去。

评选的标准

新侨会议之后,文化部迅速行动起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明星”的具体工作,被交给了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

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比例分配,并考虑他们所演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出了名单。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因《红色娘子军》影片而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评选的标准是相对宽松的。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星”。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

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比例分配,并考虑他们所演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出了名单。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因《红色娘子军》影片而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评选的标准是相对宽松的。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星”。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

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比例分配,并考虑他们所演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出了名单。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因《红色娘子军》影片而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评选的标准是相对宽松的。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星”。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

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比例分配,并考虑他们所演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出了名单。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因《红色娘子军》影片而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评选的标准是相对宽松的。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星”。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